

数量的硬性考核。所长对她说的是“按你的节奏来”。王虹在那里拥有独立的研究空间，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法国 IHES，另一半在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。

一个并不被看作天才的人，换到一个不催促她的环境后，做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成果。这不是一个关于天赋突然降临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环境终于不再与她为敌的故事。

有些人的转变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压力，而是更少的干扰。

王虹身上被谈论很多的“松弛感”，落到实处也是类似的事。每周运动四五个小时，累了就休息，不累就学一些；研究遇到瓶颈不死磕，去散步，做瑜伽。她戒掉了读书和养狗这些“耗时的享受”，唯一的放松，是早起去华盛顿广场公园看狗。印第安纳大学的同行吴澍坤说，她是“疯了似的热爱数学，是我见过最专注的人之一”。但那种专注的底色，不是苦行，是一种被允许的、不必慌张的投入。

2025 年 3 月，王虹在柯朗研究所首次线下公开讲解这项成果时，教室里水泄不通，台下坐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杰夫·奇格、阿贝尔奖得主斯里尼瓦·瓦拉丹。她一边讲，一边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串公式，粉笔灰簌簌落下。一个已经做出“百年一遇”工作的人，仍然在用最古老的方式，一黑板一黑板地把思路铺开。

获奖之后，王虹极少接受媒体专访，公开露面的场合大多与学术报告有关。她更愿意把时间留在黑板上，而不是镜头前。

被注视的戒指，与那套“应该的样子”

领奖之后，另一场讨论几乎和数学本身同时展开。

人们发现王虹的黑色西装来自 Alexander McQueen，项链与戒指是卡地亚 Clash 系列，眼镜是 LINDBERG，手上还有一枚 Oura 智能戒指，整套穿搭被估算在数万元。批评随之而来：“不够朴素”。有人搬出韦东奕的矿泉水瓶和馒头，试图证明一个数学家“应该”是什么样子。

这场讨论的荒诞之处在于，它把一个数学家的学术成果和她的消费选择放在同一张天平上称量，仿佛 127 页论文的重量，会因为一枚戒指而改变。但王虹用自己二十余年寒窗换来的薪资，维持一种有审美判断的日常生活，这件事本身不需要辩护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，为什么公众仍然需要在一个数学家身上反复确认某种清贫的、去性别化的形象。而这种“应该的样子”施加在王虹身上的时间，远比菲尔兹奖之后的舆论风暴要早得多。有媒体采访时记录了一个细节：她刚进桂林中学时，因思维活跃、爱抢答，被同学当面讥讽——“你一个小姑娘，称什么雄？”

那一年王虹 13 岁，离站上菲尔兹奖领奖台还有 22 年。一个女孩在课堂上积极发言，就已经撞上了一套关于“女孩应该怎样”的隐形脚本。

成名后的王虹，生活没什么变化。大多数时间里，她依然在想难题、参加学术会议、开展讨论。密集的报告、讲座和跨洋行程接踵而至，但面对穿搭争议，她同样没有站出来辩解。王虹的存在恰好让那套预设失去了着力点：她做出了最抽象的工作，同时过着一种具体的、有质感的生活。这两件事在她身上并不构成矛盾，只是在旁人的目光里才变成矛盾。

王虹的父母“安静、实在，很少在人前提及孩子的成就，一概不接受任何采访”；北大校方也在她 2025 年夏天访问期间，替她挡下了许多媒体请求，并清理了一批假冒她之名的自媒体账号。王虹始终被一层有意识的安静包裹着——这层安静不是傲慢，而是一个做数学的人为自己保留的必要条件。

回到费城那间报告厅的窗外。古斯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大概不会去想“学术传承”这么大的词。他只是被拦在了门外，然后选择站着看完。窗内的人曾经不确定自己够不够好，窗外的人没有走开。王虹说：“要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问题，即使做不出来，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。”